

读懂“空气罐头”的隐喻

■彭原

时事聚焦

当十几年前卖水变成生意时,已经有人预言,也许某天靠卖空气也能赚钱。未料一语成谶,黔闽浙等省近日宣布准备叫卖“空气罐头”。曾经只是行为艺术的“空气罐头”,成为政府青睐的地方形象推广工具,在收获大把眼球效应的同时,触动的又是公众哪根敏感神经呢?

杜尚1919年发明了名为“巴黎空气”的玻璃瓶,他恐怕不会料到百年后,巴黎也会遭遇持续雾霾,埃菲尔铁塔与圣心大教堂都藏于白雾中,“巴黎空气”实在缺乏卖点。但是自杜尚以后,世界各地借鉴这一招的人却不少

过。德国世界杯期间,有人在中国叫卖装在空气袋里的“世界杯空气”,结果被工商部门叫停,理由是“土地与空气均不得销售”。上海世博会时,张光裕前年也曾发售易拉罐式空气产品宣传环保。这次贵州、福建旅游局再拾前慧,又有了不一般的底气。因为在今年全国两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州团审议时提到:“PM2.5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幸福,将来贵州可以卖‘空气罐头’。”国家领导人的一句幽默提议,这么快就被落实了,不得不佩服这些地方旅游局的雷厉风行。可是除了推广旅游知名度外,“空气罐头”还能带给我们什么呢?

把好空气放在罐头里,最多也只能呼吸一口。一口之后,怎么办?就

像很多网民说的,吸完之后如果再欲吸而不得,那不就是“贩毒”吗?就算去贵州旅游一次,恐怕也还是解决不了一辈子的呼吸问题。显然关于“空气罐头”,不只是简单的一笔生意,领导人的幽默另有深意。空气质量的好坏与百姓的幸福感相关,这已经是从上到下的共识。贵州为什么能够成为好空气的源头,这跟当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。贵州可以靠发展生态旅游,成为中国“好空气”的代言地,保护好这样的环境,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再深一步去思考总书记的话,也可以说是为经济欠发达但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指出了个发展模式,就是避免走工业化污染后再治理的老路,从生态文明建设中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。

作为国人,更要读懂“空气罐头”的隐喻,是对当下中国环境问题的深刻警醒。城市雾霾挥之不去,严重时近半个中国笼罩于污染空气中,这对国民健康和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严重危害。随着中国进一步城镇化,更多的地方正在加快发展工业。比如雄心勃勃要打造工业强省的贵州,工业园区正在遍地开花。在一些科幻片里,空气是作为奢侈品而存在的。如果这种科幻真的成为现实,那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。公众对“空气罐头”的敏感,实际上正源于环境不安全感与危机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空气罐头”不应该是商业噱头,更多应成为“治污护绿”的助推剂。

(来源:解放日报)

以德遗后方流长

■张保保

做父母的,都想为子孙留点什么,除想留点“硬通货”外,还会想留点什么稀世珍品以传世。

也有人不那么想。《汉书·疏广传》载,有一个叫疏广的人,是皇太子的老师。其退休后,皇帝念其人品业绩,加赐黄金20斤,皇太子另赠50斤。

面对这喜从天降的大财,疏广回到家乡后,把族人故旧请来,设酒摆宴,与相娱乐。这样的日子,一直持续了一年多。子孙们有点坐不住了,私下里找能与其父交心说体己话的长辈,让劝说其父置买些田宅,为子孙留下点基业。哪知疏广听后,深不以为然,说:作为老人,谁会不念及子孙呢?这是人之常情、世之常理。但我家“自有旧田庐,令子孙勤力其中,足以共衣食,与凡人齐”就行了。如果我“增益之以为赢余”,这是“教子孙怠惰耳”。贤而多财,是“损其志”;愚而多财,是“益其过”,不想百年之后让子孙“益其过而生怨”。

疏广一席话,引人常深思:当父母的,百年之后到底给子孙留什么,才能流长不歇?

历史是最实在的教科书。古而今,我们常常看到:留钱的,钱有腿;留田的,田连天。腿,可以走;天,可以变。以德遗后,首要的是自己有德。不能口言德,实行非;外面绣花,里面装草。千虚不搏一实。一件实事,能将一千句空喊打得粉碎。德就是这样:讲出的话,对人无益,不如不讲;做出的事,对人无利,不如不做。

以德遗后,重要的是自己追德。德无止境。不能认为自己一件事做对了、做好了,就什么事都是对的、都是好的。生活一再告诉我们:即便是一个坏人,也会有恶中之善;哪怕是一个好人,亦会有好中之失。对自己的要求,无论在明、在暗,于公、于私,都不能放松、不可放松。一旦放松,“走调”必然,“跑偏”自然,很可能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。

以德遗后,至要的是刻德。1962年的“七千人大会”上,周恩来面对“大跃进”带来的严重后果,检讨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: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、大跃进、特大跃进的标准,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%,为跃进;超过15%,为大跃进;超过20%,是特大跃进。严于解剖自己的美德,显美于当时,留芳于后世。

影,从来是随形成;响,历来是随呼至;名,一直是随功立。德亦然。生活中的德影、德响、德名,从来是随着德行、德呼、德功而成、而至、而立的。以此德遗后,不让其流长,都难。(来源:人民日报)



倒逼

在部分大中城市出现了豪宅、别墅等二手房“抛售”的现象,一些高端项目动辄降价几百万元以吸引买家。与此同时,近日公布的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(2014—2020年)》提出,2020年之前要建立在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,实现全国住房信息联网。在国家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,二者很容易被联系在一起。

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,住房信息联网一方面是城镇化、现代化的需要,另一方面也能让反腐线索“浮出水面”。届时,名下的房产不能像现金一样可以藏匿,让一些官员不得不急于抛售。

随着国家反腐力度不断加强,一些官员抛售房产的情况在短期内或将持续增加。竹立家说,在出现官员急售房产现象的时候,“向境外转移资产”的相关监测也应该进一步加强。

■新华社 徐俊

武松打虎何须景阳冈领导班子同意

■杨于泽

中纪委监察部官网3月22日发布消息称,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。就在同一天,当地省委机关报《江西日报》刊发一篇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姚木根”的署名文章,省政府官网则在醒目位置予以转载。乍看起来,似乎江西省委、省政府事先不知道姚副省长被查,因此出了洋相。

其实,省部级高官被查而相关领导班子不知情,这很正常,更是一件好事。据反腐专家分析,以前中纪委查处省部级干部,需征求省委意见;而现在中纪委报请中央同意后,就可直接查办,对当地省委只需要报备一下,而不再需要其同意。前后对照,现在的做法更符合反腐的内在逻辑一些,也更符合反腐败斗争的实际。

一个领导干部不干净,有关部门掌握了线索或基本事实,就应当及时启动查处程序。有一种说法叫“有法可依,有法必依,执法必严,违法必究”,法律之治旨在排除人情与个人意志,使规则具有刚性——执

法者听从的是法律的指令,而不是某一部分人开会权衡、算计的结果。此种原则同样适用于纪检监察,因为纪检监察是一种广义的“执法”行为。

上级纪委查处某个干部要征求相关班子的意见,立即使执法执纪活动陷入人治、人情的困局,所谓制度从那一刻起很容易低效甚至失效。很难想象,武松在打虎之前,还要争取景阳冈领导班子点头同意。

我们经常听见纪检监察部门抱怨“阻力很大”、“说情的人很多”,既然征求意见,以我们的政治文化、法律文化度之,很自然的出现支持查处的可能不多,而“不赞成”查处的必然有之,甚至变成肮脏的幕后运作。有关部门也很可能看人下菜碟:阻力小的,说明他在圈子里不得人心,不妨严肃处理;阻力大的,说明他根基深厚,干脆不了了之。

征求当地班子意见,大概是惯例,其来有自,成因复杂。过去,公众对纪检监察工作认识不足,在强调团结的政治大背景下,纪检监察

部门不希望对班子的查处影响“全局工作”,而希望班子能形成统一意见。而且,以前很多领导干部出事,多被视为“工作作风”之类的问题,查不查处的关键在于班子觉得可否容忍。重建中纪委,已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。

当前,领导干部违纪问题发生质的变化,出现大量职务犯罪嫌疑和犯罪行为,包括贪污、行贿受贿、买官卖官、渎职等,这就远非以前之“作风问题”可比。这时,涉事领导干部应当面对的是违法违纪指控和可能的法律制裁,而不是以前的“作风建设”、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所能解决的。纪检监察作为司法的一种前置程序,实际上具有准犯罪调查、准司法性质,这样的调查要经过下级党委的“审批”,其合理性是难以想象的。

现在,越来越多的“老虎”在当地领导班子不知情的情况下,被中纪委带走了,这彰显了中央“打老虎”的决心和诚意。

(来源:中国青年报)

言论观点

人民日报:

实是绩效,检验作风

作风上的实与虚,折射的是思想上的公与私。古人云:为政贵在行,以实则治,以文则不治。转型发展,离不开因地制宜的谋划、资源环境的考量;改善民生,有量力而行的理性、尽力而为的落实,才能把好事办好。不驰于浮华,不骛于虚声,沉下心来医痛点、解难事,这正是深化改革最需要的政治品质。

新华每日电讯:

答好时代考卷 不负人民重托

昨天的辉煌已载入史册,今天的考试仍在继续。书写更加精彩的“中国答卷”,这是亿万人民的殷殷重托,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神圣的历史使命。唯有对照严以修身、严以用权、严以律己和谋事要实、创业要实、做人要实的要求,把“三严三实”贯彻到深化改革全过程,落实到日常工作各方面,才能不断适应时代要求、顺应人民期待,以改革创新的新成就交出人民满意的成绩单。

人民网:

群众路线走基层也应该走网络

群众路线怎么走?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,践行群众路线,也应该紧跟时代发展,熟练运用网络,积极转变创新工作方式方法,和网络群众打成一片。将群众路线走进网络,把平时群众工作的作风带到网络中,快速办结网络群众需求,优质服务网络群众,网络环境才能更加和谐,才能真正的走进群众身边。

“双输”的杭州“限牌”教训深刻

■方益波

3月25日19点,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,突然宣布“限牌”政策。结果是政府损了声誉,百姓瘪了钱袋。一个为治理城市病而努力的政策,得到如此“双输”反应,教训深刻。

限牌限行,关系到治堵、治雾霾,本意是为公众谋福利。可叹的是,“限牌”消息发布之前,政府部门一直说不会“限牌”,结果突然推出“限牌”,这种“突然袭击”的方式,据称是为了不给政策获利留空间,但实际上不过是把权威信息发布权交给4S店。其结果是,一些4S店群发短信,言之凿凿,呼吁“速来购车,通宵营业”。普通百姓四处打探,一片惊惶。短短几天中,有销售商完成了平时不可想象的巨量销售额,在政策的风声中赚得盆满钵满。

杭州近年来推行“开放式决策”、“民主促民生”。但是这些努力在此次“限牌”中为何没有经得起考验?新闻发布会后,杭州市交通局副局长解时,摇中比例约1:4.7,就算竞价估计也会在在一万三四千元。有网友评论:看了解释,发现抢购完全没必要。人们不禁要问:为何事前要对公众遮遮掩掩呢?原因在于有关部门习惯了“密室政治”,对在与公众紧密互动下的施政方式可能带来的正面效应,心中无数,没有信心。

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年。全面深化改革难免要啃硬骨头、过险滩,这比过去更需要上下同心,共克难关。此次杭州“限牌”最大败笔也许在于,此前杭州有关部门多次传递出不会限牌的信息,最终又自己翻盘,实质是把政府的公信力看作小事。这种对于政府公信力的透支,其负面作用到底有多大?会给今后推进其他改革造成什么困难?应当如何设法加以补救和挽回? (来源:新华社)